

張國光

李揚鏡

正衍翔

翁柏年主編

自己剗給自己添了病麼。賈蓉道：「他這病也」

鳳姐兒道：「寶玉兄弟太」，叫你快過去呢。你

別在」，這」，到招」，婦心裡

不安太」，那裡又拉着你，曰」，蓉說道：「

你先同你寶叔過」，去」，我」，還」，坐兒，

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來了。這裡

鳳姐兒又勸解了秦氏一番，又低」，說」，

紅樓夢新編

去



卷 头 语

呈献给海内外的红学研究家和《红楼梦》这部名著爱好者的这本《红学新潮》，是由武汉《红楼梦》学会于1980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首次当代红学研讨会和1989年在湖南张家界举行的第二次当代红学研讨会的论文选集。这两次引起全国注目的学术盛会，共收到论文一百余篇，其中有不少文章都写得观点鲜明，论据充分，逻辑严密，雄辩滔滔，从而体现了勇于创新，敢于争鸣的精神风貌。但是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选了三十多篇进入这个集子。

诚挚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文学室编辑同志对本书的审订以及在出版方面所给予的支持！

大家知道：“红学”是我国古典文学领域很复杂的、也是最受重视的一项专门之学。尽管《红楼梦》这部小说传世不过两百多年，但在百年之前，已开始形成研究这部小说的风尚。而且它逐步由一条条的小溪，汇为奔放肆大的江河。如果要划分红学研究史的阶段，我们似乎可以说：从清朝后期到民初，是“旧红学”时期，也是“评点派”和“索隐派”占主导地位时期。而从五四以后直到四十年代末，则是“新红学”派占中心地位时期。以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是为一时期的主脑。从五十年代初以至现在，我们称之为“当代红学”时期，如果再加细分，也许可以把近十年的红学研究，单独划为“当代红学的新阶段”。近十年的红学研究，可以说是对前三十年的“左”的失误的拨乱反正；虽然还只作了些初步拨乱反正的工作，但它在对红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能及。特别是红学资料的建设工作，有了显著的成绩。

1987年，由于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上映，全国发表的评

论文章近千篇之多。这种评《红》剧之热，也有利于红学知识的日益普及。但是，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红学研究的理论发掘，还没有进入更深的层次；我国红学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毕竟和人民、时代对它的要求有着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我国已进入深化改革的阶段，广大的《红楼梦》爱好者和不少的红学研究者对我国红学研究未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开拓新的局面这一现状，不能不表示忧虑。他们甚至认为：“红学研究正面临着危机”，“亟待新的突破和发展”。他们呼唤着“富有学术分量、在总体上有所突破的红学研究著作”的产生。以上这些是北京中青年研究家在1989年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它和在此前于武汉举行的“当代红学的思考与探索会议”的精神，正是“南北呼应”的（借用一位北京红学家的说法）。

这也说明《红楼梦》和红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就是这样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正视它。而且不能“坐而论道”，必须尽快地行动。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地着手呢？

鉴于红学研究领域广阔，内容复杂而难点又很多，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只能根据实际的需要与可能，在不同时期选择一些较敏感的、带关键性的问题组织“同盟军”集体攻坚。我们认为当代红学已经有了四十年的历史，它所研究的复杂的内容，需要认真的清理；它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需要全面地反思；它所取得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科学地总结；它所留给我们的沉重的教训，更需要大家深刻地记取。这本《红学新潮》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

明人方孝孺有诗说：“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我们主张吸收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而别开生面、另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唯陈言之务去”。我们提倡：勇于打破清规戒律，把探索与创新的理论勇气，贯穿到《红楼梦》研究的全过程。我们欢迎那种开拓新的领域，发掘

新的资料，发人之所未发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即使有一些偏颇之处，也可供读者参考，并能够引起争论，以利于把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这比那些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高文典故”有益得多。

当然，我们所谓的“新”，是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之“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故意去标“新”。更不是凭主观臆断，信口开河，为了哗众取宠而发的一些稀奇古怪之论。我们所说之“新”，是要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得出的新观念、新命题。我们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赞赏敢于不同于流俗的勇于独树一帜的学风。

对本书的疏误之处敬请方家、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张国光 李扬镜 卫衍翔 翁柏年

1991年12月

目 录

卷首语	(3)
当代红学中的“双两论”与“凡是论”	常林炎(1)
我看当代红学	郭兴良(14)
——兼评张国光教授的红学“双两论”	
《红楼梦》研究必须更新观念	易锦海(26)
当代红学:必须正视的新的选择	童国安(40)
取其一点,不及其余	张金煌(48)
——评《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片面性倾向	
试谈“红学”的迷误	杨 烽(60)
红学研究中的突破之道在哪里?	贾 穗(70)
——由七十年来红学家们的“崇曹贬高”偏向引起的反思	
澄清历史迷雾,开拓红学新宇	张国光(78)
——论 1954 年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和《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同志之误理论是非与学术良心	白 盾(94)
——五十年代评红的追忆与反思	
当代红学断想	吴正南(109)
——关于五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及其它	
关于五十年代《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思考	余大平(116)
古典文学研究的新突破	白 盾(124)
——评张国光教授《古典文学论争集》的《水浒》、《西厢》和《红楼梦》部分值得重视的“红学”新见解	王永健(137)
——评张国光教授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说	
从脂本《石头记》到程高本《红楼梦》题旨的变化,看程高本之优于脂本	刘德禄(152)

作为系统的《红楼梦》·····	杨宏斌(166)
——兼评张国光教授的“双两说”的系统论意义	
《红楼梦》与《石头记》的两种“泪”与“味”·····	卓松呈(177)
“众口是非缘版本,千秋功罪待重评”·····	陈伟(189)
——访倡明红学“双两说”的文史学家张国光教授	
正邪两赋,情理曲包·····	李慕韩(196)
——对曹雪芹塑造的贾宝玉艺术形象的新探	
论《红楼梦》的著作权应由高鹗与曹雪芹平分·····	张国光(204)
也谈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	曹学伟(206)
——兼及张国光先生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	
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	纪国盛(221)
高鹗:站在巨人肩上的文学巨匠·····	盛瑞裕(234)
高鹗续书,功在千古·····	李儒科(239)
——兼评红学研究的几种错误倾向	
从林黛玉之死说起·····	肖景清(247)
从70年来的贬高成风到“扬高派”的兴起·····	徐又良(255)
——《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述评	
高鹗的惊人之笔·····	汤国梁 徐鸿岐(270)
——论贾宝玉的中举与出家	
论高鹗笔下的林黛玉之死与宝玉出家·····	彭学元(283)
红波一曲话曹、高·····	蒋兆鹤(288)
高鹗生卒年事考辨·····	郑忠权(294)
从《红楼梦》的改编看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王世德(303)
古典小说研究方法漫议·····	张虹(315)
——从高鹗续《红楼梦》谈开去	
高鹗的贡献与《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失误·····	欧阳代发(322)
春之萌发,秋之收成·····	石麟(331)
——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	

当代红学中的「双两论」与「凡是论」

常林炎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这是清乾隆时代史学家、诗人赵翼的一首七言绝句。它道出了学术随时代而发展变化的不可逆转的规律。不管其发展变化的速度或缓或快，新陈代谢的总趋向是不可抗拒的。赵氏说的“五百年”或“千年”，自然不必作机械的理解。然而，当今的“生机转化”、“日争新”的程度与速度，可远非赵翼的时代所能比拟。甚至五十年代大领风骚的红学新气象，“而今已觉不新鲜”。当然，我们绝不能无分析地是今而非昨，亦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后浪推可浪，推陈创新，乃势在必行。正当古代文学研究出现“危机”，红学研究也一时陷于沉滞状态时，湖北学术界同志们提出了“当代红学研究的思考与探索”课题，召开了“首届当代红学研讨会”，力求运用科学的方法，对40年来我国红学研究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

的总结。就个人目力所及，出现了一批具有新视角、新见解的文字，不论它们所达到的真理性如何，最终将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和结论，但它或多或少却足以发人回省，引发人们对当代红学的重新思考，其所显示的学术锐气、魄力及其学术责任心，可喜可嘉。我们多么渴望真正的而不是装点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它是推陈出新的动力。甚至我以为奇谈怪论也比老生常谈的“大实话”要好，逆流也比一滩死水为强。因为错误也会成为正确的先导。我这篇小文，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活动下写出的。

一、评张国光的“双两论”

一个《水浒》专家（在我印象中，张国光先生原不是红学家）竟向壁垒森严的红学阵地开了一炮且很有声响（我指的是张先生新著《两个〈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兼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见《古典文学论争集》）！启人深思。

张氏之学的理论家底，可归结为八个字：“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由此推及到“两种《西厢》，两个莺莺、红娘”。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武器向红学阵地开炮，提出“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我们可简之为张氏“两两论”。“两两论”是否可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目前尚不便断言。其中的某些说法，我并不完全赞成，但是，你要不赞成它，这容易；但要彻底驳倒它，我看，也难。因为它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且建立在有据的版本研究的基础之上，构成一家之言。把这种提法放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背景上去考察，也是相符的。我们从这里看到古代小说、戏曲发展史、出版史上的一大特点，从祖本到定本中经多人（不同时代的人）、长期（达百数十年或数百年不等）插手、流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难办的问题。张国光从版本研究入手发现问题，总结出他的“两两论”，得以解释纷繁得不易说得清的问题，一团乱麻有了可

理的头绪，为研究者提供了法门，开拓了思路。张氏提出《水浒》、《西厢》、《红楼》皆存在着两种版本、两个形象的问题。其实，《三国》也是如此：“两种《三国》，两个曹操”。嘉靖本与毛本中的曹操形象就有显著的不同。把两种不同的本子混为一谈，张冠李戴，把金圣叹的思想说成是王实甫、施耐庵的，把毛宗岗的话记在罗贯中名下，这不是已往常有的事？分清它，正是今天研究者的职责。古代小说，有“两两”现象，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至于这“双两”之间，是怎样关系？距离如何？孰优孰劣？如何评价？如何解释？自然是存在着复杂的学术问题，大有研究、探讨的余地。张氏用其法发现了不少问题，也解释了一些问题。他再三强调“不弄清版本真相，会给古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与鉴赏工作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会严重地影响改编的艺术品的价值。”（《古典文学论争集》第404页）其意是可取的。张氏版本之学，已越过了旧版本学偏重考鉴形式问题、量的问题的水准，他从总体上、内容上审视不同版本思想与艺术的高下，从而作出质的鉴别。其法也是可取的。从版本入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戏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门径。至于它的不完备处及存在的问题当然还有，那是可以讨论研究的。

张国光这次用他的“两两论”武器向当代红学发难，看来，初见成效。据《红学新澜》反映看，这一炮打破了当代红学一时沉滞的局面，大有“一石激起千重浪”之势。不论张氏的红学“两两论”，理论上还有什么缺欠，论证上还有哪些不够细致缜密之处，甚至还会在些微处尚有生硬之感，但是这一炮发得是时候。虽不能说它在当代红学的壁垒上已经轰开了一道缺口，但至少也是打出了一丝小小的裂纹，从这条裂缝里人们多少窥见其中的某些一向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诸如：绝对化，“凡是”主义思想，形式主义方法，新索隐派形迹，门户之见影响，等等。

二、议红学“凡是论”

如果不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的良苦用心的话，我看，也不必反其道而说高鹗比曹雪芹高明，我们反对绝对化，反对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的形式主义方法。我们不赞成红学中的两个“凡是”：凡是前80回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凡是后40回就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或者说，凡是曹氏写的都好，凡是高氏写的都坏。这种红学“凡是主义”，正是绝对化的表现形式。我们还不同意把曹、高二人有意识地尖锐对立起来，把高鹗说成是曹雪芹的敌人，企图一铁扫帚把后40回扫掉。把高鹗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是缺乏科学的分析批判精神的粗暴表现。胡适要算红学史上一位较早著名的“崇曹派”，但他还不是“凡是派”。他根据俞樾《小浮梅闲话》，认为后40回为高鹗所作，但他对后40回并不采取完全否定态度。他说：“平心而论，高鹗的40回，虽然比不上前80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下场。……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胡适在佩服高氏的悲剧眼光的同时，还感谢其“悲剧的补本”，“居然替中国文学著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红楼梦考证》）众所周知，著名红学前辈俞平伯先生、何其芳先生，他们都是崇曹的，但他们都不是“凡是派”。他们都持分析批判态度，对高鹗并不一棍“打杀”。特别是近年来，俞先生对后40回更有所肯定，他说：“据我看是高鹗续作，后40回文字上是流畅的，也看不出很大的漏洞，但关键是人物的观点和内在思想，明显看得出来是和前80回不大一样。但高鹗还是有功绩的，毕竟是把书续完了，而且续得不错。”（《大公报》1986. 11. 25.）何先生肯定高氏的最大贡献在于大大帮助了曹氏原著的流传。若无120回本的出版，很难想像《红楼梦》会很快发生如此

大的影响。他说：“续书和原著印在一起，能够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按：何氏的“读书观点”是可贵的，是今天的某些红学家尚所难及的），也有他本身的原因。绝大多数情节和前80回大致接得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不但保存了悲剧的结局，而且总的说来也还写得动人。有些片段也还写得较好。”并举实例说明某段，“构思还是不错的”，“写得符合这些人物的性格，而且也比较生动。这都是后40回的可以肯定之处。”“但另外有些部分（按：自然不是“全部”）的思想内容却违背（按：有些人便把无意地“违背”变作恶意“歪曲”、“篡改”）了曹雪芹的原意（按：这个“原意”，成为有些红学家、改编者们所热衷追捕的圭臬）。”且说，“曹雪芹的前80回并不是没有缺点和漏洞。”（均见《论红楼梦》）我们是赞赏这种分析批判精神的。老一代学者，看到了“悲剧的补本”保留了“悲剧下场的小说”；从广大读者接受的事实看到了“补本”本身的价值；或勇于修正旧的说法。凡此种种，难能可贵，但他们亦自有局限。他们把对补本的肯定或批评，大多建立在以对原本的向背为标准的基础之上，这就为习于“随人说长短”的朋友们，开辟了一条有阶可拾的小径，一场不大不小的红学“原意热”，在这里掀起了。在追捕“原意”的征程中，索隐派复活了，也大显了一番身手。

何其芳在肯定续书的某些优点之后，说：“在艺术欣赏上要求较高的人读完以后，还会感到不满足”。有那么一些论者，好像是认为贬高的法码愈重，便意味着艺术欣赏水平愈高，于是贬高之风愈演愈烈。其实，多为人云亦云。一如赵翼诗云：“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何氏说：“（高续）有些部分的思想内容却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有些人便层层加码，如说：“原著80回后的重要情节已全然被篡改，伪续40回，从根本到细节都是歪曲了雪芹的思想的。”还要追查高氏续书的不良居心：“高鹗续书，违背原书本旨，本来有其目的性，他绝不是无谓而续，他是利用

伪续的方式篡改原著的思想的。”上纲上线，大有“文革”大批判的遗风。看来，高氏续书，不仅无功而且有罪，罪且不小。过去，有人骂“金圣叹是《水浒》最凶恶的敌人”。而今看来，高鹗也成了曹雪芹的最凶恶的敌人。40回续书不成另一部《荡寇志》，至少也是曹著的“谤书”！骂高氏“特别恶劣……削弱和磨平了曹雪芹批判封建正统主义思想和反对封建统治的锋芒。”“曹雪芹是坚决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高鹗则是封建正统思想的信奉者……”；把两人竟说成是誓不两立的政敌。于是由崇曹到迷信曹，由贬高到排高，包含着两个“凡是”的红学“凡是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日趋壮大。“凡是说”的核心，便是“迷曹排高”这四个字。《红楼梦》电视剧的编、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学术领域内掀起的一场“迷曹排高”运动，是红学“凡是主义”理论的一次实践，是“凡是论”推行的最高潮，同时也是红学“凡是派”的一次大胜利——如果他们的代表作《红》剧能经得起观众、读者的考验的话。《红》剧的上映，或许对红学“凡是论”的可能或早日得出结论会产生促进作用。

改编者们一再声明：“我们的改编原则是‘忠于原著’”，“我们的改编只对前80回负责。”可以！创作自由嘛！但是，还要求“读者和观众从忠于小说原著的角度进行评论”，这就不可以了，评论也是自由的嘛！哪能替人家定框框、划范围？你说“高续”是怎么的坏，可以；你说《红》剧是如何的好，更可以。但不应把《红》剧以前的所有的剧本、即所谓“向来的剧本”都一笔扫之，以显“惟有我高”。请看周汝昌先生的《红》剧“序”中一段话：

雪芹的真《红楼梦》，自从乾隆末年遭到程高伪续书的偷天换日以后，原著的80回后的重要情节已然全被篡改，伪续40回，从根本到细节都是歪曲雪芹的思想的，向来的剧本，都能沿袭了程高的伪续的那些“场景”，并且认为“好戏”正在这里，正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做特做。那些剧本十分欣赏那个“李代桃僵”的“掉包式”爱情小悲剧，以

为《红楼梦》的“顶点”和“精华”就在这里，这样的见解一旦定型，当然不可能另有心胸手眼。而现在的这个电视剧本，却第一次敢于打破二百多年来程高所设置的坚固的枷锁。（本文的重点符号系引者所加）

我们且不问对续书如此激烈的指斥，到底有多少根据，单说对“向来的剧本”，冷嘲热讽，一概骂倒，断言其“不可能另有心胸手眼”。是何“心胸”？是恨乌（“伪续”）及屋呢？还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呢？无论如何，这个打击面可太宽了！何妨打个比方：老王卖瓜，可以自夸，但不一定要叫嚷别人的瓜都是苦的，职业道德嘛！我们还怀疑：“伪续”既是那样的“拙陋、淡而寡味，结构松弛，人物个性不鲜明……”糟得不能再糟，怎么竟能成为“二百多年来程高所设置的坚固的枷锁”呢？“二百多年来”，说得也似乎有些夸大。程甲本、乙本出世的年代，周先生绝不会不知。乾隆辛亥、壬子至他为《红》剧写“序”的1987年，并未到二百年，这是常识。那么何必一定要说成“二百多年”呢？这恐怕和周先生习于夸大其词（或为言过其实）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它和同文中“全被篡改”、“都是歪曲”之类，同一思路、一气呵成。这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出于一般的作者，全不为怪。问题是周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颇有影响，把这种不严谨、不科学的语句写进堂而皇之的“序言”中，难免有人仿效，从学风上说似乎也不能说是严肃的。

请允许我作一点声明：我在本节中使用了红学“凡是主义”、“凡是论”、“凡是派”等词，借用现成词，便于记忆，但没有丝毫的恶意。它纯为学术概念，与其他无涉。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我承认他们是红学、特别是当代红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将来的红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他们有理论有创作，且有人才。我以为吴世昌先生亦属此一流派，（代表作见英文本《红楼梦探源》和中文本《红楼梦探源外编》），但吴先生亦是我素所敬重的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之一。至于他们的是非功过，自然可以讨论，然而结

论还有待于明天的红学史家去做。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这一客观存在，我所起的“凡是”之名，我认为是可以概括其实的。如果认为不当，那就听红学史家的便，群众也可另作设计。

三、说《红楼梦》电视剧

《红》剧是“凡是论”指导下的产物，但我反对“凡是论”却不完全否定《红》剧，且认为它在某些方面有着前无古人的成功高度。这怎么解释呢？首先，它是一门综合艺术，在美术、音乐、摄影诸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观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赢得广大群众的喜悦（我以为对文艺的评价，应目有群众，作品经过读者或观众才能完成其作用任务）。特别是荟萃了那么众多、聪颖、年轻、俊俏、整齐、洋溢着生之活力的演员，与我们其他舞台上出现的演员老化、设施陈旧的情景则形成强烈的对比。再如，衣饰、陈设、场面、装点，都是那样的考究认真，富丽华贵，处处给人以浓郁的审美享受，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欣赏口味，使得一些地方的同类古装戏，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这方面的成就，在中国影剧史上是创纪录的。《红》剧正是在这里赢得了观众。

其次，在编剧上也不是一无可取的。我是不赞成绝对化和排高主义的。但在对曹雪芹的艺术的高度推崇这一点，我和他们也有共同之点，我也认为曹雪芹确是伟大的。且认为编剧者只需能把曹氏的艺术在他们的剧作中表现出十之三四，那也会给观众一份珍贵的精神食粮，他们的工作就会取得局部的胜利。《红》剧对观众所产生的魅力，正是来自这里。尽管编者一再地宣言：“我们的改编原则是忠于原著”，“我们的改编只对前80回负责。”遇到了困难，此路不通！于是只得承认：“我们在改编工作进行到80回以后部分时，所抱的态度便是‘忠于原著，重视续作’——续作中凡与原著相契合处，则尽量采用”。（均见周雷等《红》文学

剧本《代前言》”这与对高鹗深恶痛绝的激进“凡是派”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这种“重视续作”的态度，值得欢迎。已往，人们把创作实践中出现的这类现象，称之为“现实主义方法的胜利”，现在我们可以说它是：“凡是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剧作者既承认“续作中凡与原著相契合处”云云，可见周汝昌说的“原著前80回后的重要情节已然全被篡改，伪续40回，从根本到细节”都是对原著的“歪曲”等等，这就未免太武断，连编剧者们都无法接受了！

《红》剧的三位编者我以为是有才能的，他们的任务太艰巨，太繁难了，其成品有如今天这样的屏幕规模，已不简单了。这就有点不好意思再说三道四，惟恐是苛求了。谁知事有不测，它和最近掀起的“红学新潮”算是裹在一起了，这就不得不勉为分说，借以引玉。

《红》剧有得有失，失在哪里？总的说来，失在“凡是主义”上，迷信脂本、脂评，追捕“原意”，大大束缚了作家自由创造力，把文艺创作变作为代圣贤立言，还有人告诫剧作家：“任凭他们有多大的才能，却不许‘自我膨胀。’他们的任务职责，是尽一切努力去‘显现’雪芹，而不是显现‘我自己’。这一点，至极要紧。”且以为“成功或失败”，“就是取决于这一要点”《红》剧本“序”）我看，幸好作品中还是有一点“自我”的，只是太不够了，成为作品的一大缺点。如果连一丝的“我自己”都没有，那还能称之为创作吗？

由于要“忠于原著”，追寻“原意”，有时不得不索隐求微，以考证学代替创作论。《红楼梦》，《红楼梦》，梦是它的最大特征，从梦中托出了一个艺术世界来。当你步入这世界时，便会有“看了这壁，觑见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之感。它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你思之不尽，味之无穷，“谁解其中味？”一片白纸黑字，诱你无垠的联想、思索、猜度、反刍……这是因为它本身存

在有一种迷离不确定性，含蓄的暗示性，这正是《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群中所显示的独特性。如果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求与《红楼梦》艺术韵味相近的作品，《离骚》或可当选。香草美人亦可延展读者的想像力与思辨天地。《红楼梦》中处处是谜，是疑，是不可解，缺陷，是玄而悬之。甚至曹氏没有把它写完，也构成了一个残缺令人思辨的天地。生活的无限性，是作家无法通过有限的语言词汇无遗地述说尽致的，只有在作品中为读者提供联想思索的空间，才可补偿作家的“有限”的局限，读者的想像力是可以达到“无限”境界的。记得在五十年代，一位外国教育家批评我们的中学文学教学有如把嚼烂的食物喂给学生，使学生失掉自由思考的余地。一部伟大的作品绝不应该像是嚼烂的食物，不能剥夺读者积极想像的自由。想像咀嚼，正是读者的审美享受和再创造，虚灵美，不确定性，正是《红》小说的成功之处。恰好相反，影剧的特性规定它要有确定性，它要把原作留下来的思辨空白、想像余地，来个填平补实，真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这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难以满意由小说改编成的影剧的，它常常会扼杀小说独特的虚灵美的，懂得了这一点，批评家们怕就不能不笔下留情，《红》剧自然没有也摆脱不了这一常规的“大煞风景”。现在的问题是：可以摆脱的，它也并没有摆脱。

二百年来，各类红学家想方设法，就是要把《红楼梦》的“梦”变为非梦，一心把梦境统统变为现实，他们索隐探微，求证考实，煞费苦心，作为研究的步骤，作为科学范畴，似乎无可无不可，要是以考证学来代替创作论，那就会扼杀艺术的。今天的电视剧作也还是没有离开这条索隐考证的老路子，只是所索的是曹氏“原意”的隐，脂评的隐。凭一鳞半爪的批词，就要端出一个艺术世界，拾片言只字或几句残断诗词，便要构成一段重要情节，作则可作，成功难期。犹如文物工厂用不同色调、纹理不衔的碎瓷片修复成一具古瓶，虽然已具原型，终缺浑圆统摄体系，

追索“原意”，揣摩坐实，它必然会妨害艺术。《红》之失，失在这里。举凡剧中的败笔大体多出在这里，弃宝玉“神游”，取可卿“淫丧”，便是例证。秦可卿之死，本是曹氏所惨淡经营（可能也是改编者出力不小的篇章），似有苦不可明言者，便用环境陈设烘托，用其他重要人物陪衬，留下一片朦胧景象和思索空地，推出一段充满着虚灵美的锦绣文章。可是编剧者偏偏要考证坐实到“淫丧天香楼”，终于出现了那幅为众所诟的、败兴的翁媳床上镜头。再如，一桩桩一件件要落实清算王熙凤的罪恶帐，把这个有才缺德的金陵一钗、大观园中的女杰，过于坐实罪恶化，最后还要来个长长的尸游行，是不是以明其死有余辜？其实是把这个有肉有灵的复杂人物给予简单化、肤浅化了，实际上是剥夺了观众的思辨空间、想像自由。同样用考证学方法（不是从完整的人物的历史命运出发），凭一鳞半爪的所谓“愿意”根据，坐实到让贾宝玉去讨饭，其结果是悲剧不悲，迹近滑稽，观众哗然。其实过分地追索“原意”是没有意义的。所谓作品的“原意”不见得就必然是作者所给予的原意，而常常是由解释者的认识水准、知识结构、历史文化环境、心理素质所决定。就是让曹雪芹复活，自己解释自己作品的“原意”，也未必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从《红》剧的演出效果，已证明这种钻牛角尖办法的失败，也是红学“凡是主义”理论的失败。

对于古代题材，我认为应持博览精采的态度，取各家之长，去各家之短，不问门户，惟优是取，以见当代作家的胸襟气度。由于排高主义，惟恐“实际上，成了‘忠于续作’，而前80回原著的作用，只不过是替续作铺垫了。”（见《代前言》）于是排掉了一些戏剧性甚强的精采而有价值的情节，良为可惜！我们一向是忽视欣赏主体的，实际上，没有读者（或观众），作品就等于没有完成。特别是剧作家，在任何时候不能短缺群众观点。续作再不如原作，但它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广大读者的检验，不惟不被